

彭歌訪問記

「愛書的人」

夏祖麗

那天，彭歌是抱病接受訪問的，他的臉色看來有點蒼白，但精神仍很好。坐在靜靜的客廳裏，他非常誠懇的說出他對書、翻譯及寫作的看法。

民國五十九年，彭歌出版了他的第十三本長篇小說「從香檳來的」之後，就沒有再寫小說。近年來，他的寫作偏向專欄、翻譯、評論、遊記，及對新知識、新觀念或新作品的介紹。這對喜愛他的小說的讀者來說，是個損失，對他個人來說又何嘗不是一件遺憾的事，因為他的志趣還是在寫小說。只是他近年來工作忙碌，沒有太多的時間，而小說是需要較長的時間，心力集中才能寫出的。

他說：「雖然我以很大的誠意與熱情來寫專欄及評論，同時也得到讀者的謬賞，但我總覺得這不應該是我『幹它一輩子』的事，於是，這中間就出現了一種妥協的情況——我翻譯了一些外國作品，其中有的是很好的小說。」

彭歌認為這種妥協也就是對自己的讓步和安撫——自己寫不出來的時候，就翻譯一些別人的作品吧！於是「改變歷史的書」、「權力的滋味」、「浩劫後」、「人生的光明面」、「天地一沙鷗」、「輪影

人生」等書就分別問世。這些書受到讀者熱烈的反應，也給文壇上帶來一陣熱潮，而其中有好幾本至今仍在暢銷中，這是彭歌始料未及，也深感欣慰的一件事。

自從中國有了外文翻譯作品以來，所謂翻譯的三要件——信、達、雅一直是大家爭論的焦點。對於原事創作，再從事譯作的彭歌來說，他對翻譯是抱着什麼樣的看法呢？他說：

「我覺得，翻譯的基本目的是讓不懂的人懂，應該要做到『信』，但『信』不應祇是字面上的『信』，更要緊的是把握住原著者的精神及心願。我想，翻譯的人應該完全沒有自己的存在，在翻譯時應抱着『如果這個作者會寫中文，他現在寫出來會是什麼樣子』的心理。有人認為翻譯要忠實原著，即使不通都可以，這種論調未免太勉強。因為，語文是反映文化思想的，有些詞句如果完全照字面譯，中國讀者無法體會，而這也就失去了原作者原來的意思了。所以我認為，如果只是忠實書中的字句，不能傳達其精神，那也是枉然。」

「林語堂先生就曾舉過好幾個英文華語化的例子。喬志高先生在他的『美語新詮』書中，對這個問題



也有很深入的探討。」

近年來，彭歌翻譯的作品，多半是富有戰鬪精神及鼓勵積極人生的。他認為我們正處於國家多難，人心脆弱的時期，我們的國策是反共產、爭自由，而很可惜的是，我們文壇風氣却是十分『美麗與哀愁』。他燃起了一根烟，沉思了一下說：

「我們的民族優秀，歷經苦難，我們忍受外來的不公平遭遇，自己却堅持自己的道路，這種中庸的精神是值得宏揚的。在臺灣的中國作家們，作品中表現出一種積極而沉着的態度，雖然皆以反共為基調，但作品中涉及政治色彩的並不多，我覺得我們很需要反映真實人生與時代意義的戰鬪性作品。我也願意多譯介一些富有戰鬪精神的作品，使文化精神在交流中得到鼓勵。」

一向謙和穩重的彭歌，在說這番話時，却有一股掩不住的激動。接着他又說：

「當然，我不否認我們人生的境遇中有許多壞的、黑暗的，我也不反對寫出社會真實面，但是要看看你是用怎樣的出發點來寫，最起碼要真實，也就是作者要了解實況。比如要寫礦工生活的悲慘，先要了解悲

慘在何處？但是一般人只是「想當然耳」。雖說文學是想像的，但作品本身也要堅實，作者要了解透澈，寫出來才不會空洞或沒有真實感」。

從翻譯我們又談到近年來大家很關心的一個問題——中文輸出。做為中華民國筆會的會員，又曾多次代表我國出席國際筆會，彭歌對於增進國際間文學的交流工作很注意。他說：

「要我國文學作品進軍國際文壇，基本上要有好的作品，其次要有翻譯文學作品的人才。這種人不僅要懂外國的文字，熟悉兩國的文化背景，還要對文學愛好。把中文譯成英文的費用可能比原著的稿費還高，而在中國譯介作品不多的情況下，要在國際書市場上銷售，恐怕很難。因此頭一件事必須要做到即使不得利，却也不能賠錢的情況。我們的好作品還是有的，也許剛開始做不會引起外國人的注意，但數量多了，就會引起外國人重視了。」

「我想，我們現在對中文輸出所應做的事，一方面要鼓勵英文好的中國人多譯介中國作品，另一方面也要聯繫中文好的外國人來做這個工作。」

「據我所知，有一個叫 Seidensticker 的美國人

就是專門翻譯川端康成的作品。他精通日文，熟悉川端作品，但他還說過川端作品中最美的、最好的部分，也就是他譯不出來的部分，由此可見翻譯之難。」

彭歌是在抗戰後期到大後方，在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的。民國四十四年，政大在臺復校，彭歌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回母校新聞研究所。民國四十九年他又到美國深造，攻讀新聞學。

這些年，彭歌也一直是在新聞單位工作。接受了多年的新聞教育，從事多年的新聞工作，新聞對於彭歌的寫作是否有很大的影響呢？他說：

「新聞事業是很重要的，但過分強調新聞工作的態度，有時對世界也有妨礙。像現在一窩蜂的過度拿新聞做為最後價值評斷是不對的，我們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新聞報導和以後的歷史對照起來，會發覺有許多觀點都不一樣。有人說小說比歷史重要，歷史比新聞更重要。我想所以有這種說法，是因為新聞所記載的只是當時的情況，歷史却是事後以正確客觀的態度寫下的。而小說更是以人性出發點來寫出，它對人的感動力更大。」

「新聞工作實在太忙了，這個沒完，那個又來了

，使人不能專心想一個特別的主題。我倒不覺得新聞對我的寫作有什麼大的影響力。」

當彭歌在南伊利諾大學獲得碩士學位後，他又進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圖書館學。一年之後，又獲得碩士學位。是什麼動機使得彭歌在唸完新聞後，又去唸圖書館學的呢？他說：

「學了圖書館學後，我深深感到知識分子要做的事太多了。有太多的東西需要整理、加以說明，使其發生更大的影響。」

彭歌認為有系統整理書評與書目是迫不及待的事了。尤其是書目更需加強。所謂書目，不僅是做基本的工作——列出書名、作者、出版年月、何家出版及分類。更應利用這些原始資料再進一步加以分析、評註及研究。經過整理比較之後，才可以看出這本書是有用？無用？只有一時的效益或可以永遠存在？其他像書評索引、書評文摘也是可以根據書目再做出來的。

彭歌捺息了烟頭，再燃起一根烟，繼續說：

「現在臺灣平均每年出版四千本書，其價值如何？應該有專家加以客觀的評鑒。做學問的人最苦惱就是，不知臺灣有多少資料書籍，要研究起某個問題時

，常常有不知去那裏尋找資料的茫然。幾乎每一個人開始研究一個問題都要從頭開始，這是一種浪費。

「最近國立政治大學，有一位唐屹先生，他是伊斯坦堡大學博士，就遇到了這種困擾，他目前正在研究蒙古史，蒙古史在近年來頗受人重視，歐美及日本的學術界也有人在研究這段時間的歷史。而唐先生在國內無法找到資料，於是只好到美國去找。這件事也使我想到，如果我們的書目工作做得好，如果我們有很完整的中國歷代各朝的書籍、地圖等原始資料，那研究起來就方便多了，更不必求之於人了。」

也許有人一輩子不覺得這方面的缺欠，但在學術界，這個痛苦是很普遍的。

「最近葉維廉在聯合副刊上撰文，也提到這個問題，他說他十四、五歲時，曾猛讀自五四以降到四十年代的作品，尤其是詩方面的。但現在時時想追捕當時的印象，發現那些書都無法找到了，心中無限沮喪。他很感慨談到，現在年輕的作家是全無五四以來新



文化、新文學傳統的持續意識和歷史透視的，他們想讀也不易找到書本。

「雖說現在已進步到電腦時代，但是如果沒有很完整的原始資料，建立系統，那電腦也無法幫得上忙。」

「過去，曾有些海外學成的人士回國，服務了一段時間又再行出國，原因之一是，在國內住久了，就和原來所學的東西脫節。這是實情，社會日新月異，

如果不能得到自己本行的書目、索引，就無法知道這門學問最近的發展和變化，的確會造成脫節的現象。

這也是我們知識界較弱的一環。」彭歌認為現在科技方面的書目資料做得還不錯，像中山科學院的圖書資料差不多已經上路了。這主要原因是科技方面的西文資料本身就已經相當系統化了。國家科學基金會也有資料中心，因此，自然科學界做研究工作就要容易得多了。

另外像農業方面農復會出版品的農業索引做得很不錯，也一直沒斷過。農復會圖書館的馬景賢先生目前正在做所有關於中外研究與中國有關書目的整理。這個工作是相當艱巨的，目前還沒有人做過。馬先生還做了從民國三十八年開始，所有臺灣雜誌討論有關臺灣經濟問題的文章的書目。他說：

「近幾年，臺灣工商業發達，但有關工商的書目索引却很缺乏。在遠東，日本、韓國都已經做得很不錯了，我們實在應該迎頭趕上。」

他很感慨的說：

「二十多年前，曾有西方學者在訪問臺灣之後，說我們這兒是一片文化沙漠。當時曾引起我們知識分

子的不滿與震動。但是我們不得不承認，臺灣的書籍的確缺乏系統化的整理，圖書資料不足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即使極其有限的圖書資料，也仍缺乏系統化，邏輯化的整理，以便於讀者查考參閱而發揮其更大效用。」

他很推崇目前全世界最大，也最重要的參考書出版公司——威爾森公司的作法。

他說：「這家公司所出版的數十種英文索引，書目參考工具，其影響與貢獻都是世界性的。由於這些參考工具，使得各立門戶的學問與知識，建立起更為密切的互相關連，尤其重要的是，在各門學問範圍之內，使同類作品的內容，經過科學化，系統化的整理與安排，成爲一個井然有序的整體。」

他把這些索引，書目等，比喻做鑰匙，一套套的鑰匙使人打開知識的府庫。

目前，彭歌是中央日報總主筆，每星期他固定要爲中央日報寫一到三篇的社論，另外他還在聯合報撰寫「三三草」專欄。

每星期，他在臺灣大學圖書館系有七小時的課，他教的是西文參考資料、書評寫作及大眾傳播。

每天，彭歌的作息時間幾乎是排得滿滿的。教書，必須要做準備工作。撰寫社論，更需要參考許多資料，不斷的吸收新的知識及專門性的學問。他很少參加應酬演講，座談會也儘量避免，爲的是多寫點東西，多看點書。他也經常做筆記，這是爲他將來寫小說蒐集材料的。

做爲一個新聞工作者，看報是他每天不可缺少的。因爲時間不夠，雜誌只能做選擇性的閱讀。讀書是彭歌的嗜好，也成爲他的生活習慣之一，他自認在這點上他是很幸運的。

在中外作家裏，他最欣賞的是托爾斯泰。他認爲他是一個天才，而且他所有的天才都用在寫作上，並且發揮出來。

他說：「有時看了一本書，心裏會想，也許自己也可以寫得出來，但是有些作品看後，自己却很明白自己今生今世是永遠寫不出來的。托爾斯泰的作品就給人這種感覺。『紅樓夢』也給我這種感受。」

靜靜的客廳裏，彭歌用純正的國語，有條不紊的談着。偶爾，嫺靜的女主人——徐士芬女士，很客氣的出來招呼茶水。客廳佈置得樸素而穩重。一面牆的

大書櫃，除了書，看不到什麼擺飾，看得出主人是個愛書的人。

椅角的大茶几上，擺放着一個鏡框，是彭歌和他的兩個兒子姚晶、姚珪的合照照片，照片中彭歌正對着鏡頭，姚晶和姚珪一人一邊，側着臉吻着父親的雙頰，彭歌笑得開心、好年輕。

照片中的兩個孩子只有七、八歲的樣子，推算起來這張照片恐怕有十多年了。但是眼前的彭歌，除了臉龐胖了許多以外，看不出有什麼改變。我不免驚奇歲月並沒有在彭歌身上留下太大的痕跡。彭歌開心的笑着說：

「大概男人都不容易顯老吧！」

年輕時代的彭歌，看起來是個書生的樣子，今天的彭歌更添增了一分中年人的睿智及瀟灑。

對於當今臺灣社會的讀書風氣，彭歌認爲有很好的趨向。因爲新書越來越多，幾乎每個星期都有新的出版社成立，這顯示有人買書。

他覺得，目前主要的問題在於，父母及師長怎樣來輔導年輕人看書，培養他們讀書的興趣。而且知識界也應該有一個很客觀的評鑒制度，光是靠一、兩個

人主觀的鑒是評沒有多大作用的。他說：

「現在大家過分強調『評』，其實書評不祇是要評，首先必須要讀者知道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然後再對書的好壞加以評鑒。」

「我認為壞書根本不值得評，所評的書應該都是合乎讀者需要的。這樣才可以達到助長推廣讀書風氣的目的。」

他建議多頒發各種類的「獎」，來鼓勵好的作品，並藉此掀起讀書風氣，像日本的芥川獎是為通俗小說而設的，直木獎是為正統文學作品而設的。這兩種不同類的獎，在日本都受到相當的重視。再者美國的普立茲獎，甚至世界性的諾貝爾獎，都是在作家及讀者心目中具有相當份量的。

臺灣雖然也設有多種獎，但在讀者與作者之間似乎並沒有發生太大的作用。

他覺得我們不妨參考外國的方法來做。像外國的圖書館學會每年也有選當年度好書的工作。像美國的紐約時報、時代週刊每個星期都有一個暢銷書的目錄，這是根據全國書商提供的統計資料做出的。這種暢銷書目只是提供讀者一個參考，與書本身的好壞無關

，更不是價值判斷。他認為讀者具有相當的水準以後，所謂的暢銷書目只可供參考，對他們選書的影響並不太大。

時代週刊每年還有好書的介紹，並有專家總論這一年的美國出版界，往往寫得都很客觀，有時也加以嚴厲的批評。

總之，在國外有許多機構在做這些事，這對推廣文藝及教育都有很大的幫助。

彭歌曾說過，影響他人生最大的體驗有三次——第一次是民國三十二年的太行山之行，他首次覺悟到山河之大及自身的責任；第二次是三十八年到達臺灣的感受，刺激了他創作的努力；第三次是赴美留學的三年四個月，使他真正得知為學的門徑；體驗出知識的尊嚴與必須。

這些也激起他寫作的熱情。

他說：

「從大陸來臺灣後的頭些年，我們的小說以描寫大陸上的生活，作家個人的童年的回顧較多，這是一種懷鄉病，是古今中外都有的例子，可以說是經過戰亂後一種痛定思痛的感覺。近十年來，新作家以社會

寫實方面的作品爲多，這可以說是應有的趨向，以前是同顧，現在開始往前看。

「文學與科學不同，往前看或往後看不一定決定作品的價值、主要還是在於寫得好或不好，我覺得不必說從某年某月以後就不必談，或是光談現在，不談過去。有人說經過八年抗戰，大陸淪陷這一段大的動盪，我們却一直沒有好的現代史小說。我想，也許是現在還沒有。像以南北戰爭爲背景的『飄』，就是在南北戰爭結束後五十年才寫出來的。『戰爭與和平』也是在戰後經過一段不算短的時間才問世的。隔了一段距離再用小說的方式來寫那段時間的事，也是不壞的。」

目前，彭歌的兩個兒子都不在身邊，老大姚晶自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已出國深造。老二姚垚臺大中文系畢業，目前正在服兵役。平靜和諧的家居生活是彭歌寫作不斷，進修不停的主要原因。彭歌曾對人說過，由於他太太的生活簡樸，治家有條不紊，以及對他不間的鼓勵，使他能不必爲生活和家務操心，而能安心讀書專心寫作。

他認爲一個人常常因爲許多責任在身，而無法完

全按照自己的心願行事。如今他的孩子已自立，使他有更多的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他說：

「人生百年，在你所能的環境中盡到你最大的努力，是最快樂的事了。能做得好固然最好，如果不能做得好，能盡了力也就很好了。」

告辭時，我們一起從六樓搭乘電梯下來。彭歌推他的眼鏡，厚厚的鏡片後閃着學者的睿智，開朗的神情中帶着滿足的笑意說：「對於寫作的人來說，所有的痛苦都是有報償的。」

烟 愁

琦 君 著

每冊40元
郵購九折

從六版的「烟愁」到新作「三更夢書當枕」作者一貫地以樸實平易近人之筆，寫她對親人、師友的懷念；童年、鄉土的眷戀，日常瑣事的感受，文字如風行水面，而自其功力，尤其透出東方人真摯、溫厚的情操。這也許是中、英、日「讀者文摘」一再選用琦君散文的原因，讀一篇定會接讀二篇三篇，細細的體味而至愛不釋手。

書評書目出版社印行。全省各大書店均售